

甲午海祭

★历史爱好者丛书

《历史爱好者丛书》编委会

主 编 宋德金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和(常务)

孔德龙 张亦工

宋德金 林建初

姚玉民 高世瑜

廖晓勉

战争与军事系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甲午海祭/许华著. —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6.3
(历史爱好者)
ISBN 7-5080-1002-7

I. 甲… II. 许… III. 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 IV.
K25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2732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5印张 133千字 2插页

1996年3月北京第1版 1997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册

ISBN 7-5080-1002-7/K·079

定价:9.8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作者简介

许华,1963年生。1985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现任军事博物馆正营职馆员。从事军事史研究有年,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海内外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著或合著有《海权与兴衰》、《百年国耻》、《中国近代反侵略斗争》、《世界航空工业概览》等书近十部。曾被聘为《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撰稿人、12集电视剧《北洋水师》和15集电视剧《长天烽火》历史顾问等。在甲午战争研究方面有很多独到见解。

编者的话

历史学是一门古老而有活力的学科。它的鉴往知来、资治育人的社会功能，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孔夫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就是说，历代社会的因革都有规律可循，从夏、商、周的变化情况，可以推知后世的演变趋向。清人龚自珍说：“欲知大道，必先知史。”章太炎说：“不读史，则无从爱其国家。”把读史知史视为做人 and 爱国的前提。于此可见前人对历史是何等重视。毛泽东爱好历史，并号召全党都要“学点历史”更是众所周知的。

我国老一辈史学家是很重视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的。三四十年代，范文澜著《大丈夫》，吴晗著《历史的镜子》，胡绳著《二千年间》等，五六十年代，吴晗主持编写“中国历史小丛书”和“外国历史小丛书”，都产生过很好的影响。令人欣慰的是我们这套丛书的作者中有不少知名学者和研究有素的专家。我们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史

学工作者关心和重视这项工作。让历史学走出书斋,服务现实。

这套丛书首批两个系列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和华夏出版社联合推出。如果读者需要,我们将继续编辑出版其他系列。

由于时间仓促,缺乏经验,一定会有许多不足之处。我们竭诚欢迎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便把以后的工作做得更好。

1995年11月

西方列强滚滚东来

- 人类对海洋的兴趣以及国家对海洋的兴趣,几乎全是对运输即贸易的兴趣。海上商业在任何时代都最能致富。

——美国海军学院战略学
教授威廉·耐策尔

- 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贸易;谁控制了世界贸易,谁就控制了世界的财富,最后也就控制了世界本身。

——英国爵士沃尔特·雷利

一、酣睡不醒的东方巨人

以炎黄为始祖的华夏民族,自久远的上古年代起,就世代繁衍生息在欧亚大陆板块的东端。源远流长的黄河,温和湿润的气候,肥美的土壤和丰饶的物产所构成的优越自然条件,使华夏民族创造出享誉世界的灿烂文明。

世人往往瞩目于中国古老的黄河文明,但事实上从上古时代起,中华民族就向海洋迈出勇敢探索的脚步,在蔚蓝色的海洋文明中写下不朽的篇章。

辽阔无际的神州大地,濒临太平洋西海岸,拥有 18000 多公里的漫长海岸线和 6000 多座星罗棋布的大小岛屿,使我们的祖先在久远的年轮里,与大海结下了不解之缘。记载中国上古时代典章文献的《尚书》中“四海会同”、“环九州为四海”、“江汉朝宗于海”等记述文字,明确反映出华夏先民们对大海最初始的朴素认识;而《尔雅》中“物产富饶为陆海”的论断,则表明我们的祖先早在上古时代就非常客观而敏锐地认识到,海洋与大陆是一个有机结合的统一体。

考古发现的材料证明,早在久远的上古时代,华夏民族就生活在涛声不绝于耳的大海之滨。我们民族的始祖轩辕黄帝曾“东至于海”(见《史记·黄帝本纪》)。《周易》中所述“伏羲氏剡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于天下”,反映出我们的祖先对利用海洋的理性认识。在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的木桨和舟山群岛出土的大量陶器,不仅证实了六七千年前就已出现了舟楫,而且表明古人在五千

年前就往返于大陆和舟山群岛的波涛之中。同样能够证明海上交通情形的大量实物,也发现于辽东半岛和黄河沿岸的文化遗存之中。上述典籍所载的文字材料和南北海演出土的丰富实物,无不向世人表明,华夏民族是世界上最早走向海洋、经略海洋的民族之一。在数千年的古代历史上,对蓝色海洋文明的不懈探求,成为我们民族延续不断的一大文化传统,它经过历朝历代的不断发展,在15世纪上半叶达到最为辉煌的顶点。

公元1368年,元王朝的残暴统治被元末农民起义军彻底推翻。以朱元璋为首的大明王朝封建统治者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使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繁荣。15世纪初即位登基的明成祖永乐皇帝朱棣继续大力推行开放国策,“锐意通四夷”,一心要在其有生之年建成一种前所未有的天下太平、万国咸宾的隆盛之世。从1405年至1433年,郑和作为永乐皇帝的特别使臣,率领庞大的船队,以“自强不息,协和万邦”的精神,先后七次扬帆远涉重洋,访问了东南亚、印度洋、红海及非洲东海岸马达加斯加等37个国家和地区,在人类迈向海洋的庄严史诗中谱写下空前辉煌的篇章。

在“洪涛接天,巨浪如山”的汪洋大海上,由数万人和百余艘船组成的郑和船队向世人展示了一幅“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涉彼狂澜,若履通衢”的壮丽画卷。这幅慑人心魄的壮丽画卷,不仅充溢着中华民族勇于探索海洋征服海洋的顽强不息精神,而且包含着闪耀中华民族聪明才智的堪称世界之最的高超航海技术和杰出航海能力。最大的宝船排水量达14800吨,可载重7000吨,有九桅十二帆,行驶在万顷

碧波中蔚为壮观。1414年郑和船队第4次出航横跨印度洋,是有史籍记载的首次跨洋航行,比西方航海探险家哥伦布的大西洋之行早78年。当时绘制使用的《郑和航海图》不仅是我国最早的不依赖航路说明而能独立指导航海的地图,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一部航海图集。郑和船队采用的“罗盘定向”和“牵星过洋”等航海技术,开天文导航之先河,居世界领先地位。

郑和七下西洋之壮举,是世界地理大发现的先导,具有远远超出航海范畴的广泛而深远的历史意义。有一位曾在英国牛津大学长期致力于海洋历史文化研究的外国朋友威廉姆斯,用身兼政治家(特里尼达和多巴哥总理)和历史学家(牛津大学博士)的独特眼光,对中国历史作过这样一段评论:要是郑和的远洋事业能够继续下去,进而到达美洲大陆,其影响所及,会把世界历史推进到一个新的方向。

这毕竟只是一种推理和假设。不幸的历史事实是:中国的郑和没有成为哥伦布,甚至“郑和之后竟无第二个郑和”。这是为什么呢?郑和并非没有哥伦布的素质和机遇,也并非中国的航海技术没有到达美洲大陆的可能,而是由于中国没有成就哥伦布的时势,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没有创造一个新时代所必备的海权意识。

更为不幸者在于,中国从明朝开始,出现了一个与世界性的走向海洋的时代大潮完全相反的逆向运动——禁海。

明代初年,中国沿海地区受到倭寇严重袭扰,由山东逐次向南蔓延,至苏、浙、闽、粤等广大地区,其所到之处烧杀掳掠,无恶不作。为此,自明太祖朱元璋开始,屡屡发布禁海

令。其初衷是禁止内地商贾出海勾结倭寇从事海盗贸易,以免危及沿海地区的社会安定,保证国家财富不致外流。此举严重束缚了中国人民向海洋发展的活力和进取精神,无异于因噎废食,它必然导致国家僵化、停滞、远离世事而痛失文明交流的恶果,完全与其良好初衷相背离。

特别要指出的是,朱元璋开了一个锁国禁海的先河,他所建成的海防体系不能不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海防具有保卫国家安全的功能;另一方面,又具有捍卫国家禁海令并阻止民间海上贸易的功能,其核心是“守”与“防”。这说明,中国的海防从一开始就不是海权意识的产物,而是没有积极开拓精神的闭关自守国策的结果。从本质上说,它是中国封建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产物,是重农轻商和重陆轻海传统思想的产物。

明代中期以后,中国的海禁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以致“片板不许入海”。嘉靖年间(1522—1566年)明世宗下令:“一切违禁大船,尽数毁之”;“沿海军民,私与贼市,其邻舍不举者连坐”。明朝的水师舰队,越来越专注于执行政府的禁海政策,这不啻是将发展海权的支柱变成了遏止海权意识和束缚海权发展的桎梏。在此期间,虽有少数文臣武将提出一些重视海洋和海权的积极建议,但此时的整个中央王朝最高封建统治集团已开始处于昏昧麻木的状态,对此不予理解和重视。而就在中国致力于紧门闭户的禁海之际,西方殖民主义者则开始掀起了浩大的海外拓殖浪潮,并开始叩击中国的国门。1514年,葡萄牙舰队首先闯入广州湾东莞县附近的屯门岛,后获准租用澳门居住。随后,西班牙、荷

兰和英国的船队络绎东来。

清王朝立国以后,颁布了与明王朝相同的“寸板不得下海”的禁海令,继之又颁布迁海令,强令闽、粤、苏、浙沿海居民内迁50里,越界者立斩不赦。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清政府再次严厉禁海,停止与南洋原本规模甚微的贸易。次年,英国政府派遣特使马戛尔尼到天津,请求在舟山和广州等地开港,并通市天津,结果被康熙皇帝“逐条指驳”而断然拒绝。

自19世纪开始,封建专制统治下的中国与欧美资本主义各国的实力差距已逐步拉得很大。但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的清朝封建统治者却对此毫无感觉,他们夜郎自大,固步自封,满以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真地认为中国是整个世界的核心。在1793年,乾隆皇帝致信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时竟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1816年,嘉庆皇帝与大臣孙玉庭有过这样一段天真得可笑的对话:

嘉庆皇帝问:“英国是否富强?”

孙玉庭回答:“彼国大于西洋诸国,因此是强国,至于富嘛,是由于中国富彼才富,富不如中国。”

嘉庆皇帝问:“何以见得?”

孙玉庭回答:“英国从中国买进茶叶,然后转手卖给其他小国,这不说明彼富是由于中国富吗?如果我禁止茶叶出洋,那么英国就会穷得没法活命。”

甚至连后来因禁烟而出名的林则徐这样一位很有见识的高级官员,在与洋人直接打交道之前也曾幼稚地认为:“我中

原数万里版舆，百产丰盈，并不藉资夷货”，如果中国封关闭市，则“各国生计，从此休矣”。

悲哉！五千年的文明古国，四百余年的闭关禁海，竟蒙昧至于如此。对西方世界在此四百年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巨变，竟是这样的一概不知，全然不晓。进入 19 世纪的中国，就是这样处于昏庸腐朽、愚昧无知而又妄自尊大的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之下。这个硕大无朋的东方巨人，还沉醉在昔日辉煌文明的眩目光环之下，在封建专制统治的病榻上酣然安眠，长睡不醒，纵任时光从身边悄然流逝，而对于已默然降临身旁的一场前所未有的灭顶之灾竟然毫无察觉。它必将受到历史的无情惩罚。

二、凶悍东来的西方列强

自 16 世纪开始，世界迈步踏上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旅程。坐落于大西洋波涛之中的英伦三岛成为这一历史新时代的“弄潮儿”：因为新大陆的发展和环球新航路的开辟成功，将国际贸易中心从地中海推到大西洋，从而使处于世界航道要冲的英国摇身一变，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占据了举足轻重的位置。

经济与海外贸易的兴起，不久就引发了上层建筑领域的“大地震”。17 世纪 40 年代，英国率先爆发了具有世界影响的资产阶级革命，为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扫清了主要障碍。到 18 世纪初，经历了大动荡的英国政局相对稳定下来，逐步确立了君主立宪政体、两党制和国会内阁制，稳固

了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联合政权,为资本主义的工业革命奠定了十分有利的政治基础。

登上政治舞台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立即将手中新掌握的权柄化为发展资本主义的强有力的杠杆,大举推行一系列促进资本主义工业、商业和航运业发展的政策,从而使英伦三岛又一次独领时代之风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进行工业革命的国家。机械师约翰·凯伊的机械梭(1733年);纺织工人詹姆斯·哈格里夫斯的“珍妮机”(1765年);理发师理查德·阿克莱特的水力纺纱机(1769年);牧师艾德蒙特·卡特莱特的水力织布机(1785年);教具制作员詹姆斯·瓦特的联动式蒸汽机(1782年)……,这一项项发明,使各行各业的生产效率获得呈几何级数的倍增。

到19世纪30至40年代,英国完成了这场历经80年的工业革命。这场工业革命,由普普通通的能工巧匠及他们充满智慧的发明成果所构成,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极为深刻的革命,对整个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等的变革,都起到了当时人们难以预料的深刻而深远的影响。这场革命,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最终确立奠定了坚不可摧的物质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对这场革命作出了这样的高度评价:“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工业革命的丰硕成果,使机械化生产的工厂在英伦三岛工业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并使英国成为“世界工厂”,在世

界工业生产和国际贸易中居有垄断地位。1820年,英国在世界工业总产值中的份额竟占有50%之巨。工业革命的巨大成就,有力宣告了蒸蒸日上的资本主义制度已不可逆转地取代了日益衰朽没落的封建专制制度。从英国萌生的这一新的生产方式,对于促进欧洲大陆和世界其它地区的社会变革,均产生了重大影响;工业革命的先进科技成果以种种方式和不同途径传播到世界各地,有力地推动了世界各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法兰西、美利坚等国的资产阶级也纷纷登上各国的政治大舞台,导演出各自不尽相同的工业革命历史大剧目。于是,逐渐形成了以英国为世界头号强国和以法国、美国等为二流列强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

在大举进行工业革命的同时,为开拓和争夺广阔的世界销售市场和廉价的工业原料产地,以英国为首要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还将贪婪而凶残的目光投向了遥远的海外世界。从17世纪50年代至18世纪60年代,英国人凭借强大的海军舰队先后打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及法国,成为称雄一时的“海上霸主”。到1835年时,英国以年产纱锭900万枚、铁102万吨和煤3000万吨的雄厚经济实力作后盾,成为全球无以匹敌的最强盛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超级大国(而此时中国清朝统治者还认为一旦离开中国的茶叶,“英国会穷得没法活命”),其海军的炮舰在世界每一条航道上都留下了航迹,并在遥距英伦三岛的大洋彼岸建立了一片又一片的殖民领地。而法国和荷兰等二流列强也不甘示弱,纷纷越过大洋,争相建立各自的殖民领地。

与工业革命给西方各国带来的社会繁荣兴盛景象形成

鲜明反差的是,19世纪的中国大地从北到南是一片凋零和衰败。“日之将夕,悲风骤起”,成为时人对当时社会情形的生动概括。清王朝的衰败,表现在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整个政权统治机构因循守旧,毫无生气;皇室骄奢淫逸,豪门贵族挥金如土,官场贪污腐化,地主官吏巧取豪夺;土地兼并愈演愈烈,苛捐杂税日甚一日,阶级矛盾不断激化。在以满洲贵族为首的满、蒙、汉贵族和大地主的压迫和盘剥之下,各族群众难以为生,苦不堪言,被迫揭竿起义,掀起武装反抗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的斗争浪潮。而在上层建筑领域,清王朝则采取怀柔与高压并用的手段,实行严厉的文化专制政策,一方面竭力宣扬忠孝仁义的孔孟之道,倡行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程朱理学;另一方面又大兴文字狱,对那些略有不满情绪或对时政稍作讥评、甚至完全无辜的知识分子,大肆进行屠戮株连的残酷迫害。本来理应担负引导民族前进方向的知识分子群体,头脑被禁锢,言论受钳制,从而使整个社会与整个民族都处在一种死气沉沉的暮色之中。

但就是这样一个毫无生机的中国,却被西方列强视为一处必欲攫取侵占的宝地。早在13世纪,一部《马可·波罗游记》就将中国的繁华盛景传达给西方。18世纪的第一个元旦,法国王室举办化妆舞会,参加者竟不约而同地化妆成中国人,以显示自己拥有高雅的品位。1794年,特使马戛尔尼从中国带回一册绘有假山和石景的园林风光画,英国人欣赏备至,争相在自家的庭院里堆砌假山石景;一时间,用中国山水和花鸟图案装饰建筑物成为欧洲的时尚之一。中国的丝绸、茶叶、大黄,成为西方各国最昂贵的消费品。

西方新兴的资本主义列强有着无止境的对外侵略扩张的殖民本性；以雄厚经济实力为后盾的军事力量特别是海军舰队成为西方列强海外侵略扩张的有力工具；美丽富饶的辽阔中华大地早已是西方列强垂涎三尺的一大目标。这三项因素，业已注定中华民族将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灾祸，可谓在劫难逃。

三、睁开双眼看世界

在西方列强的远征大军侵入中国之前，有一种特殊的物品早已充当了侵略中国的尖兵，这就是令人深恶痛绝的毒品鸦片。

自19世纪初，西方列强就开始大量向中国输入鸦片，以此获取暴利，攫取中国的巨额财富。到19世纪30年代，严重的鸦片烟毒已大肆猖行于中国大地；据不完全统计，1835年全中国吸食鸦片者达200万人以上。鸦片的泛滥给中国人民和中国社会带来无尽的灾难，也给清王朝造成严重的统治危机。1838年以湖广总督林则徐为代表的一些高级官员力主禁绝鸦片，他大声疾呼：“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兴思及此，能无股栗！”不久，林则徐被道光皇帝任命为钦差大臣，南赴广东全权禁烟。

1839年3月18日，林则徐在广州正式发布禁烟谕帖；6月3日至25日，林则徐将收缴到的237万多斤鸦片在虎门海滩公开销毁。中国方面的禁烟行动，惹怒了以英国为代